

# 二十年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

陆学艺

## 一、农村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看,20年来农村改革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冬。这是改革农村经营管理体制,使农民获得自主和实惠,恢复家庭经营,从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的阶段。

1978年冬,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决定(草案)》,提出了25条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政策,诸如要切实保护生产队的自主权,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等。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凝结了三十年农村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文件阐述的一些理论和原则,至今仍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各地在贯彻《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不久就集中到改革农业生产的经营体制上来。原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民在生产队长率领下,像工厂一样,集体劳动,敲钟上工,吹哨下工,每天评工记分,到年终按工分分配,实际是平均主义。农民在田里,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劳动生产效率极低,农业生产上不去。《决定》提出,要“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农民根据《决定》这一条,包产到组就在各地迅速推开了。与此同时,安徽肥西县山南区农民在省委书记万里同志的支持下,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1979年获得意想不到的大丰收。甘肃、内蒙古、贵州等省区,也有包产到户的,也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此时上下对包产到户有种种议论,反对的声浪很高,但实践的效果都极好,消息陆续传到党中央,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5月31日发表了著名的农村谈话,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人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凤阳县,约大部分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以后,包产到户就在各地推开了。1980年,凤阳县的大包干(到组),转变为大包干到户,总结提出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受到了农民的更大欢迎,纷纷向包干到户转变。1980年10月中央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经过争论,会议通过了座谈会纪要,一面继续肯定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另一面也明确指出:群众要求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从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全国迅速推广,1980年11月初,全国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15%,到1981年10月双包到户的生产队占45%,到1982年冬,双包到户的生产队占89.7%,到1983年底,全国589万个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占97.8%,实行包产到户的占1.7%。至此,以包干到户

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在全国普遍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创造。既保持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符合农村生产力的水平,也符合亿万农民的心愿,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又使农民得到实惠。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并不年年都好,但农业连续6年大丰收,一年上一个新台阶。1984年粮食总产8146亿斤,与1978年的6095亿斤相比纯增2051亿斤,每年递增5%,每年纯增342亿斤。1984年棉花总产12516万担,比1978年的4340万担增加1.88倍,每年纯增1362万担,每年递增19.3%。这是农业生产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举解决了全国的温饱问题。我国50年代是年年纯出口粮食的,从1958年办人民公社,59、60年就大减产,自61年开始以后年年纯进口粮食。1984年特大丰收后,1985年就出口粮食了。1984年农业总产值达3214亿元,1978年只有1397亿元,扣除物价因素,6年增长46.3%,每年递增7.7%。这六年也是农民收入增加最快的,1978年,农民人均年纯收133.6元,1984年达到355元,扣除物价因素,每年递增15.1%。那几年,农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这是农村改革后,出现的第一个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

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88年。农村改革超出农业生产领域,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城乡改革交织进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粮棉生产出现了新的徘徊。

1984年农业特大丰收,粮、棉、油、糖、果、菜、肉、鱼都创历史最高产量,出现了全国性的卖粮食难,卖棉难。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决定从1985年起取消统购(粮棉),改为合同定额收购,并实际调低了粮棉收购价格。还调减了1985年粮棉播种面积。这给农民一个不正确的信号,以为国家不需要这么多粮棉了,种粮种棉的积极性受到压抑。1985年粮食减产564亿斤,下降6.92%,棉花减产4222万担,下降1/3。从此粮棉进入了一个新的徘徊期,一直到1989年粮食产量才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

农村自普遍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增,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农产品大量生产出来了,二是田不够种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了,他们要求寻找新的致富门路。而这时城市刚刚启动改革,有大量回城知青要安排工作,加上户口制度的限制,于是农民就在原来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小型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国家有鉴于农民的这种动向,于1984年批转了农业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正式批准把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并制定了多项支持和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

1987年社队企业只有152.4万个,职工2826万人,产值493亿元,只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25%。1984年以后,乡镇企业在全国迅猛发展,到1987年企业总数就达到1750万个,职工8805万人,总产值4764亿元,超过了当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1/2,由农村副业变成了农村主业。1988年乡镇企业继续发展,达到1888万个,职工9545万人,总产值6495亿元。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的支柱产业,也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1985—1988年,粮棉生产陷入了徘徊期,但农民有了农业生产自主权,转而多生产其他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等多种经营,主动地进行结构调整。所以这几年,粮棉以外的农业生产都很好。与1984年相比,1988年油料达到1320万吨,增长11%;糖料6187万吨,增长19.4%;水果1666万吨,增长69%;水产品1061万吨,增长71.4%;肉类2193万吨,增长42.4%。因为这些产品的价格,多数已经放开,市场价格提高很多,农民增加了不少收入。另外还有乡镇企业的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但是,由于粮棉徘徊,主产品没有增加多少收入。而这几年化肥、农药、薄膜等生产资料价格猛涨,农业税增加,农民各种负担加重,增支因素多了。198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44.9元,比1984年增加189.6元,扣除物价因素,平均每年的纯收入递增5.1%。比前六年

的增幅是大为降低了。值得指出的这阶段农民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乡镇企业等非农收入，而中西部地区还是以农业收入为主，收入增加不多，所以东中西部农民收入的差距扩大了。

第三阶段，从1988年秋到1991年冬。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持，1990年农业再度特大丰收，但乡镇企业滑坡，农民收入增加速度进一步趋缓。

正当1985—1988年粮棉生产徘徊的时候，新一轮的工业发展高潮掀起了。1985年—1988年，连续四年高速发展，平均每年递增17.9%，而这四年，农业产值每年只递增4.1%，特别是粮食，1988年粮食总产是7882亿斤，比1984年还少264亿斤，而这四年人口纯增6689万人，加上工业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提高，粮食缺口增大了，1986、1987年市场粮价的涨幅都在20%以上，又带动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猛涨。1988年上半年，国家出台物价改革政策，企图改变两种价格的矛盾状况。但因物质条件准备不足，群众又缺乏价格改革的心理准备，所以当物价改革的信号一传出，群众纷纷到银行提款，抢购物品，不少商店被抢购一空。1988年8月，国家决定推迟物价改革进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社会经济秩序才恢复正常。

因为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支撑不了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求，1988年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市场价格继续大幅增长，这对农业生产是有利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1986年以后国家增加了农业的投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1989年粮食总产8151亿斤，比1987年增产269亿斤，1990年风调雨顺，当年粮食和各种农产品获得大丰收。粮食当年增产772亿斤，总产达8923亿斤。棉花和其他农产品也大幅增产，农业总产值比1989年、1990年两年共增产1041亿斤粮食（这两年又纯进口272亿斤粮食），一举改变了连续几年粮食供应困难的状况，到1990年新粮一登场，农村再度出现全国性的卖粮难问题，国有粮站无库可容，无现金支付，出现了全国性的打白条现象。

1990年大丰收之后，市场粮价直线下跌，特别是东北玉米特大丰产，玉米价格跌得最多，从0.30元/斤降到0.22/斤，还有价无市，无人购买。所以1990年农业丰产了，但不少粮棉主产区的农民没有增加收入。1991年南方大水，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苏，受灾严重、损失很大，北方粮区因粮价下跌，打击了积极性，1991年粮食总产只有8706亿斤比上年减产217亿斤，下降2.5%。

1988年下半年，国家开始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紧缩银根，提高存贷利率，首当其冲的是国有大中企业，许多基建项目停工下马。1989、1990年两年约有1000多万民工被清退回乡。乡镇企业也受治理整顿的影响。1989年乡镇企业的个数和职工数第一次出现负增长，当年企业减少19.5万个，职工减少178.7万人。1990年继续滑坡，乡镇企业又减18万个，职工再减202万人。1991年，乡镇企业才有恢复性的增长。

乡镇企业的滑坡，直接影响农村剩余劳力向二、三产业转移，1989、1990两年还回流了，农村新增的劳力都压在农业上，致使1990年在农业就业的劳动力又增加到60.1%。乡镇企业滑坡，财务状况恶化，导致职工工资福利收入减少，也直接减少了农民家庭的收入。1990年农业增产，因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没有相应增收。而这几年农业生产资料涨幅很大，农民实际收入减少。1989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601.5元，比1988年的544.9元，增长10.4%，而当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17.8%，所以实际收入是负增长，1990、1991年两年农民收入虽有少量增加，三年平均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只递增0.7%，这是20年中农民收入增长最慢的三年。

第四阶段，从1992年到1996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新一轮全国经济高速增长，全国出现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大量农业生产要素转到非农业领域，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压力，再

度出现粮食等农产品供给紧张，物价猛涨的局面，国家进行经济整顿，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和扶持，1995年粮食增产，1996年农业获得第三次特大丰收。

1992年，全国范围出现了经济发展的高潮，当年工业、建筑业增长21.2%，1993年又增长19.9%，1994年增长18.4%，城市里各种建设突飞猛进，使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成绩巨大，举世为之瞩目。但就在同时，农村的土地、劳力、资金等生产要素都大量迅速地转向非农业，不少地区为了上项目，还向农民集资、摊派，农民负担大量增加。农民群众有很多意见，干群关系紧张，再度出现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徘徊，供给不足，引起粮价大涨。

1992年冬，党中央有鉴于农业生产不稳和农民有意见的状况，江泽民等同志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1993年一年，仅党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强农村工作，增加农业生产，安定农村社会等的指示和文件就有38个。终于遏制了农村形势向不利方向发展的势头，但农业生产仍未有大的增长。1993年的粮食虽增长276亿斤，但仅是恢复性增产，略高于1990年的水平。而这三年消费需求是大幅增长了。所以当1993年秋粮登场时，市场粮价就大幅涨价，引起社会的不安。1994年农业生产继续下滑，当年粮食总产8902亿斤，减产228亿斤，供需缺口更大，国家不得不动用国库储备，并且又向国外订购粮食。市场粮价暴涨，带动其他农产品上涨，当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上涨39.9%。1994年全国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4.1%，有关方面指出，其中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带动的。

1993年下半年开始，国家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紧缩银根，再次压缩基建投资，同时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增加投入，治理打白条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并两次提高粮食和棉花的合同订购价格，加上市场粮价上涨，刺激了农民种粮种棉的积极性，有些在外打工多年的农民工，也纷纷回乡种田。1995年粮食增产430亿斤，总产达9332亿斤，缓和了粮食的供给矛盾。1996年，全国农业又夺得了改革以来第三次特大丰收。粮食总产突破1万亿斤，达10091亿斤，比1995年又增915亿斤，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幅增产。

1992年到1994年，乡镇企业出现了继1984年到1987年后的第二个发展高峰期。1992年和1993年，国务院连续发了两个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文件，再次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特别强调要加快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展，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乡镇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出现了工业小区，办起了一批三资企业。1992—1994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586万个，职工增加2409万，总产值猛升1.4倍，纯利润增长1.3倍。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1995年、1996年乡镇企业转向平稳发展，信贷和销售市场等外部条件日趋严峻，环境迫使乡镇企业调整结构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竞争实力，有些集体所有乡镇企业进行改制，探索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少数乡镇企业则因负债过多而陷入困境。

1992年到1996年是我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5年，综合国力极大地增强了，五年中，GDP增长了73.8%，每年递增11.7%。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76.6%，每年递增22.56%，钢材增加3700万吨，电增加4000亿度，冰箱、彩电产量都翻了番。这五年，农业总产值增长31.67%，平均每年递增5.6%，粮食产量增加1384亿斤，突破1万亿斤大关。这五年，农民生活水平又有很大提高，1996年，农民人均年纯收1926元，与1991年的308.5元相比，增加1217.5元。这几年物价涨幅较大，扣除物价因素，增加31.25%，每年递增5.67%。这是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的五年，农民生活普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又盖了一大批新房，在发达地区，有不少农民盖了别墅式的小洋楼，家用电器也大量进入农家。有一部分省、市已进入小康社会，有少部分发达地区的市、县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迈进。

第五阶段,1997年以后,1996年农业特大丰收后,正是宏观经济调整后期,市场疲软,粮食等多数农产品卖难,农业产业化在各地兴起,乡镇企业滑坡,外出的农民工回流。

1995—1996两年,粮食增产1188亿斤,加上这两年又纯进口粮食578亿斤。一下就改变了供求形势,由买难变成卖难,国家仓库爆满,市场粮价下跌30%以上,1997年粮食略减,总产为9883亿斤,秋后粮食还是卖难。1998年遇大洪水冲击,损失很大,不过全国农业还是丰收年景,粮食总产与1997年持平。国家出台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并部署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

乡镇企业面临结构改革和体制新的阶段,受市场影响,多数加工产品销售困难,负债严重,经济效益下降。1997年乡镇企业2015万个,比1995年减少187万个,从业人员13050万人比1995年增加188万人,但比1996年减少458万人。1997年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20740亿元,比1996年增加18%。1998年上半年,乡镇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加15.4%。各地乡镇企业正在抓转换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竞争能力。有些地区的乡镇企业,经过调整和完善,已呈现出蓄势待发的劲头,等待外部环境变化,准备再创辉煌的态势。

由于市场粮价和多数农产品价格下跌,农业丰产,农民没有丰收。加上这几年外出民工大批回流,高峰时到过8000万人,1997年只有3400万人,1998年还继续回流,这也减少了农民的收入。乡镇企业不景气,减少了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1997年农民年纯收入2090元,比1996年增加了164元,扣除物价因素,只增长4.6%,比1996回落4.4个百分点。

## 二、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启示

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全会高度评价农村改革2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就,为全国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全会对20年农村改革创造的丰富经验,作了全面总结,概括为五条基本经验:第一必须承认并充分保障农民的自主权,把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核心是要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第二,必须发展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探索和完善农村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这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第三,必须坚持以市场取向的改革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并逐步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第四,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群众推进改革的伟大事业。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都是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的结果。第五,必须从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农业,使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相互配合、协调发展。首先启动农村改革,以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推动城市,又以城市的改革和发展支持农村。这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路。农村改革所以取得如此成功,说到底,这是坚持邓小平理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最根本的经验。

《决定》把20年农村改革,总结五条基本经验和一条根本经验,这不仅仅是今后我们的农业、农村工作要长期坚持和应用,而且也是我们的城市工作、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战线可以应用和借鉴的。这个总结,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很实际的现实意义。

引伸这五条基本经验,谈几点启示。

第一,农村改革是从改革农业经营管理体制突破的。农村改革开始,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文件,提出了25条加快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农民从一开始就认准了生产责任制,

先是搞包产到组，不久就转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党中央尊重农民的创造，因势利导，依靠实践效果好的威力，说服了干部群众，三年就在全国普遍实行了。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也就是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农民得到自主和实惠，亿万农民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业连年丰收，不久，就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粮食等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农村从此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许多新生事物由此滥觞出来了。

自从办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行集体劳动，平均分配，使农民丧失了自主权，否定了家庭经营，割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一落千丈，农业生产就长期徘徊不前。到1978年，全国还有1/3的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靠进口粮食，靠发各种票证，勉强解决城市居民的低水平的吃饭问题。为了增加农业生产，党和国家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农业上花了不知多少的心血和辛劳。但农业生产就是上不去。于是就寻找生产上不去的原因。有一阵把农业生产搞不好的原因，归结为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于是就开展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年经济困难后，又认为是农村的阶级斗争，认为有1/3的基层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于是就开展反五风，整风整社，搞四清运动，不断整农村基层干部，以致提出要整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发现了山西大寨大队好典型，就在全国开展学大寨运动。把个别当一般，当时有个说法，大寨能做到的，别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做到，一、二年不行，三年、四年总可以了吧！结果还是推而不广。有一个时期，还认为，农业生产搞不好，是农村劳动力不够，于是把几千万已进城就业的动员还乡，把农村务工、搞副业人批为不务正业，搞资本主义，还把2000多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把大批干部送进“五七”干校，从事农业劳动。二十多年间，什么办法都使了，农业生产就是搞不上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改革了经营管理体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产品就大量生产出来。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凡是某一个具体问题，成为全国性的，比较普遍，长期解决不了，而且久治不愈，那就不是一般的工作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制度性问题，必须对这方面的体制、管理制度进行改革，才能解决。诸如农民负担过重、土地纠纷、农产品买难、卖难不断交替，约有半数县以下干部经常领不到工资的问题，国有企业效益不好长期亏损，城镇居民住房分配不公，公费医疗开支恶性膨胀，单位不堪重负等问题。讲了多年，改了多年，就是解决不好，这些都不是单靠加强领导，做好工作能解决的，必须对经营体制、管理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找到原来体制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才能奏效。

第二，20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很好，但也不是持续稳定地增长，而是几受挫折，少了少了多，多了多了少，扭了几次秧歌。拿农业最主要的产品粮食来说，至今已是三起三落了。1984年，粮食总产8146亿斤，当年冬天卖粮难，1985年粮食减产6.9%，连续徘徊四年。1996年第三次特大丰收，粮食总产10091亿斤，这次国家注意调节，敞开收购余粮，1997年粮食减产2.1%。其他农产品，也有类似的情况。分析减产、徘徊的原因，农业上生产关系是合适的，农民有生产积极性，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是逐年进步的，减产徘徊的原因主要是在农业外部，是出在农产品的流通体制上。就拿粮食来说，现有的国有粮食系统，购、销、调、存的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很不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再如粮食进出口体制，1992、1993、1994年，粮食生产徘徊，国内需求增加，供应不足，但这几年年年纯出口粮食，加剧了缺口，市场粮价涨幅很大。1995、1996年连续两年大丰收。而这两年却纯进口578亿斤，加剧了库容的矛盾和1996年以后市场粮价大跌的幅度。这表现了目前我国农产品外贸体制反应滞后，对农业生产不能作正确的预期，实际是逆向调节。

从研究粮食和农业生产的起起落落，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条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就农业生产论农业生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必须从工农一体,城乡一体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体系来讨论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说,由于农村率先改革,农业生产的体制是好的,农业生产是可以持续稳定地发展的,但目前的粮食和农产品加工、流通体系还没有进行应有改革,还不完善。所以产生种种矛盾,由此制约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可以这样说,现在要顺利解决农业、农村问题,就要要求城市和二、三产业要加快改革和发展步伐,当然,农业和农村也要继续深化改革,要使农业和农村的生产和发展面向城市,面向工业和第三产业,也就是要面向市场。

第三,1996年农业特大丰收以后,粮食卖难,棉花也卖难,肉类、水产品、蔬菜、水果也卖难,市场价格下跌,已经持续两年多了,99年的市场预期也不好。而且许多工业产品也滞销,农电、服装、鞋帽、化妆品等等都卖不出去。生活资料大量积压,生产资料也不好销,水泥、钢材、煤炭、建筑材料也都销售困难。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全国610种主要商品排队测算分析,1998年下半年,有403种商品供求基本平衡,占66.1%,有206种商品供过于求,占33.8%,供不应求的只有一种。我们真到了工农业产品过剩,实现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了吗?1997年我国人均粮食800斤,肉类70斤,布17米,人均钢材80公斤,煤1吨,大致只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比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怎么能说过剩了呢?1997年我国生产电视机3513万台,其中彩电2643万台,电冰箱986万台,洗衣机1257万台。面对我国有3.4亿个家庭(其中农民家庭23402万个),这点家电不应该销不出去。据国家统计局抽样测算,1997年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彩电27.3台,冰箱8.5台,洗衣机21.9台。可见家电市场的潜力还很大,怎么能说过剩了呢?结论是多乎哉,不多也。但产品就是卖不出去,这是不争的事实。

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的原因,解决工农业产品销售困难的问题?合理的解释是我国目前的城乡社会结构不合理,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只有加快城镇化的步伐,才能解决。从世界现代化国家走过的历史看,城镇化与工业化是同步的。我们国家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特有的历史原因,致使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我国的城镇化还只达到工业化初期的水平。现在世界人口城镇化平均水平已达到42%,而1997年我国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29.9%。相差12.1个百分点。1997年我国的总人口是123626万人,使城镇化率提高12.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可以增加1.5亿城镇人口。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也应达到42%的水平。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稳妥的政策,加快小城镇建设,用3—5年时间,让1.5亿农民以致更多的农民到小城镇务工经商,安家落户。那么,当前许多经济问题就可以解决,至少可以得到缓解。有1.5亿农民进城,他们必须要建房、买房、租房、住宅业社会兴起,还要建设相应的基础设施,建筑业就兴旺了。农民进了城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就会改变,消费观念也会改变,加上小城镇有自来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条件,农民变为居民后,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以及服装、皮鞋等日用消费品就会大量增加,第三产业也会发展起来。另外,农村里转移出来1.5亿农业人口,农业生产不会受什么影响,农业收入不会减少,留下的7亿多人,等于就增加17%的收入,内需就扩大了。

当前的农村单靠调整产品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已经不够了,必须进行城乡社会结构的调整,打开城门、镇门,让农民进入城镇来,才能解决上述几个普遍性的问题,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余 晓